

# 中華民族壯麗史詩（續完）

樂恕人文。文一圖

## 不堪回首話抗戰

### 多少男兒在戰場

鬚髮何期漸有霜，長途碌碌復相忘。  
身非名世承新運，心似孤兒戀故鄉。  
雷雨及時萬族樂，山川致命百工忙。  
金剛坡上頻回首，多少英雄在戰場！

于右任：二十九年生日往北碚道中

我引用于右老這首詩的意思，在介紹抗日戰爭期中，大後方的情況，可以從『雷雨及時萬族樂，山川致命百工忙』這兩句中看出一個輪廓。我國的名報人，前天津重慶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先生就最喜歡右老這首詩。他在抗戰初期致淪陷後上海正言報的祝詞時，就特別寫出這首詩中的那兩句名作，以為後方情形的寫真。

我所要介紹的大後方，是指我國西南西北離敵軍比較遙遠而安全的地方，以四川西康為主，北及陝西甘肅新疆等省；南及貴州雲南諸省。

抗戰初起時，大後方自然更廣濶，及到敵軍

逐漸深入，有些地帶，如華北華東華南的重要城市 and 交通線，完全為敵軍佔據；有些地帶則又犬牙交錯，敵我進退不定。

所以，我要敘述到的大後方，是以抗戰後期，長久安全的地區而言。自然，其中也有些例外，比如說最後一二年，敵人曾經從緬甸竄進雲南西部怒江以西的地區，和從廣西突進貴州的南部等，但那是戰局一度意外的逆轉，大後方也局部暫時變成前方了。

全面抗戰一起，中央政府早就擬定了長期作戰計劃。京滬是必守但又是必失的地區，所以中央早就決定遷都四川省的重慶市，以便同敵人打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四川省是中國最富庶廣大，也是人口最多的省區。古來稱四川為『天府之國』，就是指它人稠物豐地大而言。

漢朝末年，劉備到南陽三顧諸葛亮的茅廬，請教天下大勢時，孔明先生就曾對他說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

帝業。』勸劉備進取四川，作為興復漢室，規復中原的根據地。清人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論到四川的形勝，也說是據有四川，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個稱王稱霸的大好江山。

四川省不但人稠物豐地大，而且它的四周全是崇山峻嶺，中間則是丘陵或平原的沃野；險足以阻外患，富足以圖生存。從歷史上來看，唐代在內亂或是外患時候，四川就成了當時長安朝廷和老百姓逃難的安全地區。安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吐蕃回紇入寇，人民都朝四川跑。

宋朝受到金人和蒙古人的侵犯，逃過長江，避到杭州，和戰不決，苟安無為；結果江海之險不足以阻北方的敵人南下，終而南宋不保，亡了國。

我想當年南宋如果一心備戰，積極反攻，以江東和西南相輔相依，很可以憑借半壁江山，迅圖恢復。明朝垮臺，情形又不同。內亂，內爭，內奸，再加上一個昏庸的福王，自然退到那兒也不行，非亡國不可。

這都是歷史悲劇，可發浩嘆。如果再回過頭來，談談抗戰期中大後方的情況，到非常富於懷

念價值。同時，我相信，至今還有許多國人，始終沒有到過四川雲南等地；也有許多年青人，出生在當年的大後方，未及長成即行還鄉離去，他們大概不會記得起大後方是怎樣的情況。

如果我們把大後方作成一個人體來比較，那麼，我們可以說戰都重慶是人的頭腦，成都平原是心腹，西康西藏是雙腳。我們的右臂是雲南省會昆明，手腕是貴州的省會貴陽，右拳則伸到廣西的桂林柳州。左臂呢，左臂是陝西的省會西安，手腕是甘肅的省會蘭州，拳頭則伸到新疆的迪化等地。

以這樣一個堅強壯大的態勢，迎擊從東南北三方面來犯的日本軍隊。所以我們佔了地利。因為西南西北都是居高臨下，敵人則是犯了兵家所忌的仰攻。

再說得明白一點，敵人在華北、華東，可以充分利用他們機械化部隊的優點，用重兵器馳驅在我們的平原上。可是，等到他逐漸西進，我們的山高水深，敵人不但陸軍的重炮和坦克車減少了威力，就是空軍也受到了限制，地利是逐步有利於我們的防守了。

到抗戰勝利為止，敵人除了以空軍騷擾過我們的大後方的主要基地——

四川而外，他們始終沒有一兵一卒，得以侵入四川省的方寸土地。

### 霧都重慶面面觀

翻開地圖，很容易看出重慶的形勢來。它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合流處，像一個半島。三面環水，一面有金碧山雄據在上，地形險要。四川人俗語說：「天生重慶，鐵打瀘州。」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在省會成都，可是經濟重心却在重慶。西南的商業是以它為中心的，所以抗戰以前，重慶已經很繁盛熱鬧，四川人自己叫它是「小上海」。

重慶不但經濟繁榮，形勢險要，而且山水之雄麗，也是出類拔萃的。南山巍巍綿亙，長江奔騰蜿蜒，真所謂山高水長，形勢萬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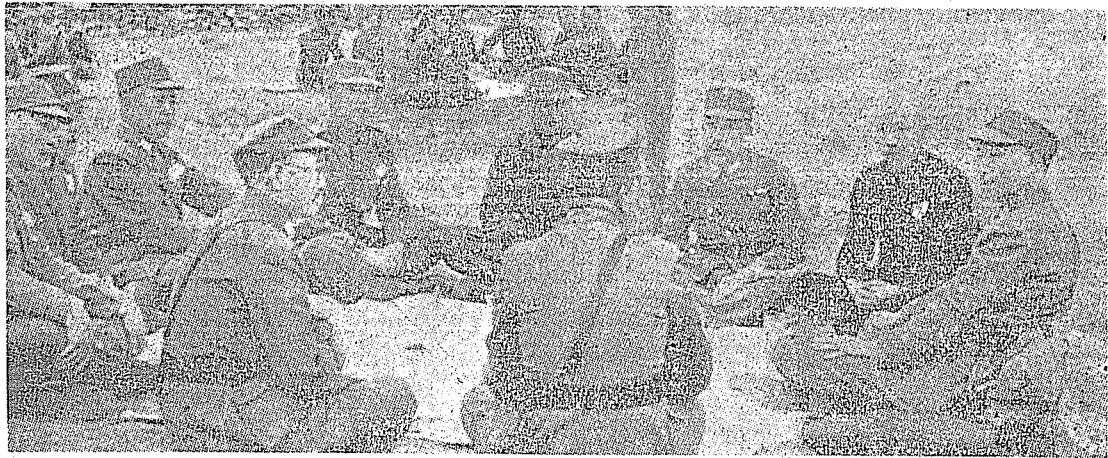
重慶在抗戰前，曾經是本省軍閥們爭奪盤踞得最久的地方，其中以劉湘為最著。劉湘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的軍長，後來打败了他的么叔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取省主席而代之，重慶就是當年他發動內戰的大本營。

劉湘盤據重慶許多年，建設是有一些兒，但是因為四川交通阻塞，內戰又不停，紛紛割據，所以建設還差得太遠。及到抗戰一起，中央遷都重慶，才着手把重慶更進一步建設起來，使它成為比較現代化的都市。

抗戰繼續展開，華北東南的人民也大批湧到大後方，到重慶，到成都，到昆明，把這三個大城市擠得人山人海。學校、工廠，如雨後春筍，縱錯林立。擠不下去，再朝其次的都市如西安、



國軍反攻敵人所陷之東陽城



形情政軍北西間期戰抗討研餐會外野議會領將事軍級高集召地某北西在長員委蔣

蘭州、貴陽等處發展。

重慶的市區愈來愈廣闊，人口也愈來愈加多。重慶本市的半島上，逐漸向後面發展，到了幾十里的地區；南面在長江以南也擴充了幾十里，嘉陵江畔的江北縣也膨脹起來。後來形成了大重慶，擁有二百多萬人口，為有史以來最繁榮興盛的時代。

它是一個山城，分為上半城和下半城，有些地方像環狀一樣，盤旋上下。市內馬路是四通八達，放射出去的公路，西達成都雅安，南通貴陽昆明，旁及湖南西部，北趨漢中西安蘭州新疆。水道更是暢通無阻，長江上溯下瀉，嘉陵江附帶其旁，可以說是水陸樞紐，交通中心。

它本身是個商埠，多少帶些俗氣，連四川人自己在打花鼓的唱詞中，也譏笑着唱道：「一進重慶城，山高路不平；口吃兩江水，笑食不笑淫。」但這並不損於重慶的偉大，因為抗戰以後，中央政府坐鎮當地，百廢俱興。論教育：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在天津的南開學校，以及原有的重慶大學等，分別建立在重慶的郊外。其他專門學校和中學更多得不勝枚舉。此外如工廠、醫院、報館，可以說集京、滬、漢、粵之大成。

重慶市區的建築自然不算偉大，但還說得上整齊修潔。因為四川農村的富庶，和出產的應有盡有，所以當年在重慶的人，誰也不會感覺到衣食的匱乏，包括戰爭中各國最缺乏的煙酒，更無所謂黑市的存在。

重慶在當年表現了全國空前的大團結，大混

合。走到街頭巷尾，隨處是南腔北調；就連飯館子也東西南北全有，再加以當年厲行新生活運動，穿衣和住處很簡單，唯「的享受便是吃。吃小館就成為抗戰中公務員、老百姓和學生們快樂的享受。

在物質上，重慶以及其他城市，不免簡陋，可是在精神上，全國都是興奮振作的。因為大家都相信抗戰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等到打垮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就可以在安樂中建設自己的國家。每個人都懷着美麗的遠景，憧憬着希望無窮的未來。

可不是，抗戰期中，英法對我們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中國和美、英、蘇，號稱四大強國。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曾經到開羅去和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舉行三巨頭會議，決定了許多有關人類的重大問題。

中國國際地位達到空前的高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袖和團體，紛紛到重慶致敬和訪問，熙熙擾擾，蔚為盛世。

重慶在當年神聖莊嚴地號召着全國的人心，在世界上是一座代表正義、公理和光明的聖地。

### 錦官城與古滇池

略為介紹過戰時首都重慶，其次就不能不提四川的省會成都。

湖南才子易君左先生，在他的遊記選裏面有一篇叫「錦城七日記」的文章。他說：人們全叫成都為「小北平」，他不禁為成都叫屈。原來成都遠在蜀漢時代就已經做過首都，後來一直是好



心背棉萬十製趕士將線前為年當界女婦慶重

幾次偏安割據的都城，可惜她沒有當過大一統的家；不然，北平在元朝起才定都，講資歷，北平還是成都的後輩呢。

政府遷到重慶，成都相距咫尺，她的重要性可以說僅次於重慶，為戰時中國的第二大都市。同時，成都原是西南文化中心，她的格局規模，面積人口，流風遺韻，遠勝過雲南的省會昆明，和貴州的省會貴陽。

成都是富麗繁華的歷史名城，明朝的開國元勳宋濂就說過：「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遠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

及到抗戰，政府一部機構，如航空委員會等，就遷到了成都；因為成都平原上軍用機場星羅棋佈，航空軍官學校、航空機械學校、航空軍士學校、陸軍軍官學校等等，也全在成都為國家培育抗戰的幹部人才。其他中國有名的大學，如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濟南的齊魯大學，北平的燕京大學等，也遷到成都郊外有名的華西壩復校，同在望江樓畔新建起富麗校舍的四川大學比鄰而居。一時弦歌四起，成都更充滿了青春和文化城濠

厚的氣息。

抗戰期間，在平津京滬的各大學紛紛遷到大後方。除了我提到在重慶成都的各大學外，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師範大學。則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武昌的武漢大學則遷到四川的樂山縣復校。至於各地有名的中學校，則由政府統籌合組為若干的國立中學，大多數在四川境內建校授業。

提起學校，可巧在成都各大學的集中地是在錦江之濱的「華西壩」；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等則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壩」；另外還有在陝西省南部城固縣的西北聯大所在的「古路壩」。

這三個「壩」，以成都華西壩為最漂亮舒適，因為它是借用原有教會所辦的華西大學的校舍。校園廣闊，危柳參天，綠草如茵，溪水潺湲；一幢幢宮殿式中西合璧的校舍，其風光較北平清華園燕園等地有過之而無不及。重慶的沙坪壩也還不錯，校舍不及華西壩，但是它擁有嘉陵江山水之勝。只有城固縣的古路壩是個黃沙地帶，茅草房若干棟而已。因此，那時學生們流行一句話：「華西壩是天堂，沙坪壩是人間，古路壩是地獄。」

華西壩上紅男綠女的壩上風光，當年使人陶醉，至今令人眷戀。我想，當年在成都受過戰時大學教育的人，一定會懷念成都。

成都有四季分明的氣候，更有武侯祠、望江樓、工部草堂、浣花溪、青羊宮等名勝古蹟；抗戰期中成都更顯得花團錦簇。猶其是吃的一道，

成都大小菜館無不精美，再加上外省飯館亦先後營業，「吃在成都」真是一點兒也不虛傳。說到昆明，她的風味情調却又大不相同了。昆明的人口僅及成都的三分之一，只有二十五萬，市區也比較小而古老。大馬路沒有幾條，到處是十足光滑的石板道。

昆明的美在四季如春的氣候，在郊外滇池西山之勝。最初四年，因為緬甸的首都仰光是我們的國際交通的大門，從各國進口的東西，全從仰光沿滇緬公路運到昆明。太平洋大戰爆發後，中緬陸上交通被敵人截斷，我們被迫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運物到昆明，再轉運重慶各地。所以在整個抗戰期中，昆明的市面是繁榮萬分的。許多冒險家和做生意的商人，全把昆明當成樂園，揮金如土，酒綠燈紅；它不像重慶那樣嚴肅而緊張。

其他的幾個大城市，貴陽局面小而較貧乏，蘭州過於僻處而荒涼，西安有些古老而沉寂；但是，在抗戰中，它們還是健康而奮發的。

### 壯丁壯丁傷透腦筋

抗戰軍興，全國呈現空前的大團結，一致熱烈踴躍，參加對日戰爭，不分前方後方、中央地方、軍隊人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陝北延安宣佈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接受中央命令，參加戰鬥序列後，人心更為振奮。老百姓誰也料不到共產黨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團結禦侮的精神，實際上僅是一種煙幕。他們藉抗戰以發展武力，推翻國民政府，

赤化中國，才是實際上的最後企圖。

中央政府既已決定長期全面作戰後，於是調整軍政機構，編練整補中央和地方的軍隊，以求增加作戰實力，對抗兇猛進犯的敵人。

在直接有關作戰機構的組成方面，中央將前方地區，包括已經正在作戰，和即將可能作戰的地區，分割為若干戰區，大概自北而南，劃為第一至第九戰區；每一個戰區任命一位司令長官，負責該戰區的軍政事宜，有時還兼省主席。戰區並不以省區為單位，而是就戰略地形加以劃分的，所以有時一個戰區，佔有數個省區各一部的地方。

在後方，四川和西康則隸屬於「川康綏靖區」，而設一主任，專門負責治安上的事宜。同樣，雲南和貴州是屬於「滇黔綏靖區」，另外則還有蔣委員長行營的設置。行營是看情況需要而定，不是永久性性質的。

戰區制自從全面抗戰一開始便已創立，直到勝利為止，並未更改或廢除，而僅有人事上的變更。

就記憶所及，第一戰區先後任司令長官者有程潛（頌雲）、蔣鼎文（銘三）將軍及衛立煌將軍；第二戰區為閻錫山（百川）將軍；第三戰區為顧祝同（墨三）將軍；第四戰區為張發奎（向華）將軍；第五戰區為李宗仁（德鄰）；第六戰區先後為在臺灣擔任副總統的陳誠（辭修）將軍及商震（啓予）將軍；第七戰區為余漢謀（桴奇）將軍；第八戰區為朱紹良將軍；第九戰區為薛岳（伯陵）將軍等軍事領袖。抗戰末期又增加第

十及第十一兩戰區，分別由蔣鼎文（銘三）將軍及孫連仲（仿魯）將軍擔任。

至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則為鄧錫侯（晉康）將軍；滇黔綏靖公署主任則為龍雲（子舟）將軍。

在中央方面，國民政府有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蔣中正（介石）大元帥，副委員長則是廿年前在蘇俄給俄共以火災為藉口而謀殺了的馮玉祥（煥章）將軍。軍委會設有參謀總長，由何應欽（敬之）將軍擔任，他並且又是行政院軍政部的部長。

全國不論中央或地方的部隊，統統由蔣委員長統率着，再由何參謀總長發號司令，指揮對日作戰。在當初，地方軍閥有不接受命令或陽奉陰違的；但蔣委員長在開對召集軍事會議，把山東省主席老軍閥韓復榘明令槍決，——全國地方軍閥們從此便小心謹慎，服從命令。所不能控制而變本加厲，違反中央政令軍令的，就只有共產黨的邊區政府和第八路軍及新四軍了。

對日作戰，我們裝備差，訓練差，尤其是像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的軍隊，因為平時軍隊腐敗，吃空額，一師部隊有的僅有二三千人，因此戰鬥力大成問題。所以我們對抗日軍，雖非如共產黨以後對內對外作戰用毒辣殘忍的「人海戰術」，但平均我們是以三個師甚至五個師抵抗日本一個師團的。只有以後駐印軍反攻緬甸，一個師的兵力火力，同日本一個師團不相上下，甚且還有過之。

抗戰一繼續持久，我們傷亡重大，兵隊的整

補，兵源的供應，立即成爲最重要的問題。因之，中央就在各省政府成立軍管區司令部，下轄因地制宜的師管區司令部若干，和縣政府的團管區司令部。由團管區司令部負責抽集壯丁，加以訓練，然後再由中央撥交各個部隊，作爲新兵，補充作戰。

我們承認，當年的兵役，是辦理得天怒人怨的。舞弊受賄，害苦了新兵。此所以後來軍政部長程潛將軍被蔣委員長下令槍斃，在當年大後方，實在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除了兵源的問題而外，同時也很重要的，就是軍糧的供應問題。在最初開戰一二年，我們產米區域如江浙和安徽，都很快便遭到敵人的侵犯，甚至被佔領。後方僅有湖南和四川兩省是米倉，及後湖南經過幾次長沙會戰，抗戰末期，長沙最後也告失守，湖南大部淪敵；因此，軍糧就單靠最主要的四川一省。不但糧食，就甚至連兵源，最後大部也靠四川的農村子弟。好在四川有七千多萬人口，天府之國，年年豐收，所以整個抗戰期間，四川人出兵出糧，對抗戰貢獻最大最多。這是四川人得天獨厚，對得起國家民族，應該引爲自豪的。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也是當年抗戰叫得最響亮的口號，大體上說來，總算還不太差，因此我們才能抵抗暴敵，到八年之久。

### 見機而作入土為安

從「蘆溝橋」戰事一起，我們就吃虧在制空權操在敵人手上。這情形到上海會戰，南京及武

漢防禦戰，敵人空軍的轟炸，不但直接給我們前線部隊以致命的打擊，甚至就連後方的供應和建設，最初也遭遇了嚴重的影響。

我們的空軍，在精神的陶鑄和作戰的士氣上，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當八月十三日上海戰幕一起，第二天敵人派了六架轟炸機，揚長直飛杭州笕橋去轟炸我們的空軍軍官學校的基地。我們的「神鷹」立刻昇空迎戰，把它們的「荒鷲」六架，完全擊落，造成當年震驚世界的「八一四」六對〇的大捷，也就是今天我們中國空軍節的由來。

但是後來，究竟因爲軍用機的質和量都遠不及敵人，以致最初三四年，弄成幾乎僅有招架，少有還擊的局面。

及後，美國志願隊在已故美國名將陳納德將軍的率領下，在昆明成立，才替中國空軍增加了作戰的有力幫手，逐漸挽回頹勢。再等到美日大戰爆發，中美並肩作戰，美國調派第十四航空隊到中國戰區作戰，制空權就轉落到中美盟軍方面，敵人已經敗居下風了。

初期，後方民衆最頭痛的事，莫過於「躲警報」了。

在戰區中，人民接近敵人，成天可能給敵人的空軍威脅，談不上甚麼「躲警報」。在後方就不然，敵人用空軍騷擾，雖遠在成都和昆明，也照樣受到敵人所加給我們的破壞和損害。因此對空襲之來，就得設法躲避。

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和四日，敵人對我們戰都重慶施以空前的濫炸，投擲大批燃燒彈，造成大

火災，重慶的精華市區，幾乎完全燒得乾乾淨淨。以後成都也遭遇一次，因空襲而引起大火，但並不在最繁華的區域。

重慶大火災過後，政府一面嚴令各城市強迫執行疏散，一面積極圖謀防禦之道。譬如在重慶，就利用山城開鑿防空洞和大隧道；在成都就挖開城牆缺口，趕築郊野小道，拆除市區火巷，總以減少敵空空襲下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爲目的。

大後方因爲地區遼闊，敵人最初以漢口爲空軍的出擊基地，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情報和時間，施放「警報」，避免空襲。

在四川，祇要敵人空軍從漢口機場一出動，我們的情報人員，立刻發電到重慶告警。只要敵機一飛進四川，我們的防空監視哨沿途都有報告，於是重慶、成都及各縣就發放「預行警報」；再接近，就發「空襲警報」，及至飛到當地近空，就發出「緊急警報」。所有的人員全進入防空洞，或疏散到安全區域了。這要到敵機離境若干里外，才能發放「解除警報」的長鳴汽笛。在重慶，因爲是山城，除了鳴放特殊警笛外，又懸掛紅綠燈球，使人們更容易加強注意和準備。

抗戰期中，最慘重的一次，厥爲二十九年秋天某一個晚間所發生的大隧道窒息案。敵機利用月夜偷襲重慶，少數敵機不斷飛來飛去，警報一直不能解除。在臨江門附近某一處大隧道中，躲了二三萬人在其中。因爲時間過長，通風換氣設備不夠，以致警報解除後，竟有幾千民衆悶死在裏面，造成抗戰八年中大後方唯一的大悲劇。

事後，民心大忿，輿論沸騰，主張要槍斃重

慶衛戍總司令劉峙，和市長吳國楨。當年在後方執輿論牛耳的大公報，曾發表社論，有名句曰：「馬駿何嘗無功，武侯不惜揮淚！」主張殺劉峙以謝國人。

劉峙和吳國楨後來僅被撤職，幸免死罪，亦可見最高統帥，愛護多年袍澤，免了劉峙一死；又因為惜才，饒赦了吳國楨一命。

「瞭警報」並不太可怕，太緊張。有時反而輕鬆有趣。在重慶，夏天到防空洞可以避炎暑，友好促膝傾談，藉此偷閒一會兒。在成都，如有夜襲，月明之夜，踱到郊野小橋流水旁，如果陪着戀人情侶，更有說不出的綺麗風光，令人陶醉忘返。

而且，西南因為地理和天候的關係，入冬及春，大霧茫茫，「霧重慶」，和「霧倫敦」同樣有名。我在倫敦住過冬天，遇過霧，那是海洋性的，濃而潮濕，其色乳黃而綠，陰沉沉得可怕。重慶則不然，是大陸性的霧，色白而較乾爽。冬季前後，早晚有霧，總會晴一會，不大看得見太陽，因此古語有「蜀犬吠日」的傳說。因此一來，半年霧季，可說是安全季節，空襲幾乎難有幾次。

抗戰期間，大後方的人們喜歡霧，霧是上帝愛護中華兒女們所賜給的特殊恩物！

## 二十世紀的大遷徙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每逢一次嚴重的外患到來，人民就有過一次大遷徙。大抵是黃河流域的人民，向南逃難，如五胡亂華，以及金人、蒙

古人的南侵。人民不但從黃河流域遷到長江流域，而且更南再遷到珠江流域。今天在廣東的客家，就是從中原避外患而南移的一部中華兒女。唐代吐蕃回紇入寇，人民逃向四川；滿清入關，許多人民也逃向長江以南，更有許多人逃到臺灣。

這是外患所引起的逃難和遷徙，還有內亂而造成的民族遷移。最顯明的一次，就是明末張獻忠之亂，他掀起：「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的七殺大暴動，把當年的四川人，幾乎殺光了；才有後來清初亂平後湖南、湖北、江西、和陝西等省的人民，大量移居到四川省去的史實。筆者的祖宗就是從江西吉安府（今廬陵縣）搬到四川去的，今天真正祖籍四川的四川人，實在是少而又少。

抗戰起後，華北，特別是華東和華中的人民，逃難到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去的最多，更大多數集中在重慶和成都兩地，其次才算在昆明貴陽西安蘭州各處，以及許多較小而富庶繁華的縣市，如四川省的萬縣和樂山縣等地。

最初二三年間，從外面遷入大後方的一部分人，和當地一些居民，曾經發生過許多不愉快不協調的小事，而且有一個時期，居然還鬧成了後方的一個問題。

那便是「主客之間」的糾紛，比如說當地人租房給外省人，乘機敲了「計竹槓」；或是外省去的寡男孤了，勾引了當地人家的女兒，就鬧成了糾紛，甚至演成了訴訟。

憑良心講，當年後方許多主客之間的紛爭，

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當地少數人士的「土氣」和「小氣」；另一部原因則是由於外面去的少數人士的「驕氣」和「洋氣」，尤以從上海一帶去的「下江人」為最甚。

寫到此，我想起了一件笑話。

抗戰前，中國科學社的學者教授們，發起「到四川去！」的運動，申言要去開發四川。自然，四川不論自古文化如何高，歷代文豪如何輩出，但談到近代物質文明，因為距海遙遠，吸收外洋事物較遲，當然較京滬平津一帶要稍遜一籌。

於是，中國科學社的先生們浩浩蕩蕩到四川開發去了。其中一位主要的負責人任鴻雋先生，他本是四川人，其奈他的老婆歷史教授陳衡哲却是外省女人。她到四川住在重慶和成都幾個月，就給胡適之先生當年所辦的獨立評論寫了一篇「旅蜀記。」

該文中，說她對四川住不慣，沒有好感，尤其其是太陽不熱，雞蛋太小之類。甚至荒謬絕倫地說，四川女學生都想嫁給軍閥做姨太太之類。這一來，成渝兩地輿論譁然，羣起而攻之，甚至要驅逐她出川。

這都是歷史的小插曲。主客之間雖然鬧過一些時候，但後來雙方有識之士出來勸說明白，大家也就相安無事了。

「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我們當年，除了共產黨人外，大體上做到了這個境地，抗戰能够打到八年，而終獲最後勝利，這是最基本的主要原因。

（全文完）